

魏晋的士人服饰

胡 迅

褒衣博带是魏晋士人的总体服饰形象。《晋书·五行志》称：“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至此，风流倜傥的宽衫大袖便发源于文人雅士之间，流行于朝野上下，以至平民百姓、奴仆侍者都追随效仿，足见风气之盛。魏晋时期的大袖长衫是在深衣上下连属的祖型之上形成的变体，比之前朝袖口有袪的袍服式敞口大袖衫，越发显示出几分灵动和超然的气质。试想，秀骨清像的文人雅士裹服在飘逸的褒衣博带中，屹立于林泉之下，真有一番独立尘世的清高傲岸。

魏晋士人褒衣博带的装束在当时还不仅仅是一种着衣的风尚，还有着服饰背后更为深层的社会原因。自魏尚书何晏服食丹药以来，上流社会便对长生不老、增益容颜的玄术纷纷效仿。鲁迅就早已把魏晋人服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讨论，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关于服药后的身体反应和服饰的关系有这样的论述：“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讲究高逸，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般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以后，因为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们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这种苦，是想借助肉体的痛苦来发散心中的悲苦，这种苦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找的苦，想以此换来延年益寿、容光焕发，以至最高层次的人格升华。这些都需要承受肉体 and 精神的折磨与修炼，将药石的神力引领到人身上，这一过程必须经过痛苦的磨砺，而这也正是魏晋士人张扬个性的独特方式之一。

然而魏晋六朝在士人情怀的影响下，毕竟还是呈现出了新的美学理想，认为“芙蓉出水”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美。晋《东宫旧事》称：“太子纳妃，有白縠、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纆。”又有《修复山林故事》称：“梓宫有练单衫、複衫、白縠衫。”可

知晋人尚白，不论婚丧均常用白色薄质丝绸制作衣衫，清逸飘洒。服饰颜色以白为贵，这是魏晋士人独有的着装特色，与中国传统民俗心理有较大区别。对于服饰色彩，中国人一向喜爱浓烈喜庆的颜色，对于官服、祭祀礼服，各朝各代更有严格的规定。自周朝的“上玄下纁”至春秋“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诗经·国风》），直至清代朝服，都是以颜色明艳的正色显贵，而平民只能着本色麻衣或绉染为褐土色。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的服饰观是极其重视色彩的，而惟独在魏晋时期空前绝后地崇尚白色服饰，这与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是一致的。身着白衫、面容清朗的名士有如闲云野鹤般超然脱俗，临风清谈中更显神超形越，不染尘滓。因此，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的白色成为一尘不染品格的最佳表现，呈现了当时审美的最高境界。

魏晋士人除了在衣饰、姿容上具有清素超然的特征外，更有一些超出常规的服饰行为，以披发跣足、蓬头垢面来显示不拘礼俗，被人们誉为放达的“魏晋风度”，其审美意趣也绝不在油头粉面之下。凡事不因循旧规、我行我素，把压抑的人性解放出来，张扬开去，这些行为特征与其他时代相比，也无疑是标新立异的了。“竹林七贤”的刘伶在屋中裸体待客已是史中常话，而阮籍也以裸体显放达，以散发去巾示悖俗，以至把这种习气传染给了与其志同道合且放浪形骸的人们，一时裸袒之风蔓延。

这或许是史载以来最为怪异的服饰观，不拘常规，恣情越礼，非常人所能接受。但魏晋风度却并不限于肆意妄为的服饰装扮上，而是具有更为明确的人生目的，那就是时代造成的、与一切人伦节律相悖逆行的心灵感悟。其实魏晋士人祛除一切缚节的放荡不羁都是与其内心人格的自我完善与自珍、痛楚与折磨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在外表上，便形成了这独特的风度，仿佛是一块带瑕的美玉，虽存缺憾，却也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